

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

中国教育史



zhongguo jiaoyushi

王凤喈◎编著

下册

主编◎瞿葆奎 郑金洲 特约编辑◎姜国钧

zhongguo jiaoyu mingzhu congbian 福建教育出版社

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

中国教育史

下册



王凤喈◎编著

主编◎瞿葆奎 郑金洲 特约编辑◎姜国钧

福建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教育史/王凤喈编著. —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11. 1

(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/瞿荷奎, 郑金洲主编)

ISBN 978-7-5334-5506-4

I. ①中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教育史—中国 IV. ①G5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7416 号

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

中国教育史 (上、下册)

王凤喈 编著

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

(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: 350001 电话: 0591-83706771 83733693

传真: 83726980 网址: www.fep.com.cn)

出版人 王旭

发行热线 0591-83752790

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

(福州新店南平路鼓楼工业小区 邮编: 350012)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13.875

字数 336 千

插页 4

版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4-5506-4

定价 31.00 元 (上、下册)

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

请向本社市场营销部 (电话: 0591-83726019) 调换。

下

册



目 次

下 册

第四编 近代教育	1
第十章 通论	3
第十一章 近代学制之演进	9
第十二章 近代教育行政之演进	51
第十三章 近代侨民教育之演进	64
第十四章 近代教育思想之演进	81
附 录	102
一、各代科举制度之比较	102

二、漫谈前清考试·····	104
三、清初俞长城之八股文·····	115
四、清末夏曾佑之殿试卷·····	117
五、湖南时务学堂·····	121
六、长沙明德学校与天津南开学校·····	129
参考书 ·····	132

第四編 近代教育

前两编已将中国四千余年教育制度与思想之演进简略陈述，即是自虞夏商周逐渐演成之教育制度至春秋战国而大变；自秦汉树立之教育制度，至清末而又大变。本编所谓近代教育，即指此大变中所产生之新教育也。此种新教育，严格的说起来，应从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颁布新学制之时起，至现在尚不过五十余年之历史。若从新式学校开始设立之时起，则应断自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至今亦不过八十余年。此种新教育，在起初纯为模仿外国，至最近教育界已公认中国教育必须适应中国的情境，教育改革已有新的动向。

本编叙述近八十年来新教育演进情形：第一，论述近代教育之特点及其产生原因；第二，论述近代学校制度之演进；第三，论述近代教育行政之演进；第四，论述近代侨民教育之演进；第五，论述近代教育思想之演进。

第十章

通论

一、近代教育之特点

新教育的第一特点为注重科学，尤其是自然科学。自然科学在中国学校课程中向来是没有的，就是在西洋，自然科学之编入课程，也是最近的事——19世纪的事。中国旧日学校之主要课程全为文学、哲学之类的；西洋旧日学校的主要课程是文学哲学及神学；故自然科学之注重，无论在中国或外国，均是新教育之特征。

新教育的第二特点为注重现代生活。新教育的主要目的，是要使个人能继续不断的改进自己的生活和社会的生活，并深切的了解二者之不可分离。故整个的教育活动，均以生活为中心，一方面从事于现在生活之改进，一方面为未来生活之预备。中国的旧教育与西洋的旧教育，均是脱离现代生活；前者讴歌古代生活之优美，以复古为目标；后者幻想天堂生活之优美，以出世为主旨；理想虽各有不同，其脱离现实生活，注重古典文字文学则一也。故注重现代生活为新教育之第二特征。

新教育的第三特点为民主精神。民主精神有两方面的意义：

其一则基本教育相同；其二则教育机会相等。前者谓国家应规定最低限度之基本教育，全国学龄儿童均应强迫受教；后者谓国家应设立各种专门教育或高等教育，凡有才智之青年均有机会入选。此种大规模之教育需要一种完善的组织、周详的制度，然后可实现。然此二者皆非旧教育所能有，无论中外，其旧教育均限于少数特殊阶级，而且缺乏严密的组织。新教育的主旨，不但须使民主精神贯彻于教育行政，并须使民主理想普及于全体国民。

新教育的第四特点为科学精神。所谓科学精神，非指科学加入课程而已，必也整个的教育活动以科学方法去研究，依研究的结果而改良。例如教育行政问题、教学方法问题，不凭主观的意见而解决，必须依据教育原理之指示，客观事实之调查，原因结果之分析。旧教育则不然，一切设施，或因袭旧习或笃守古义，以权威为指导，非以科学为指导也。

以上四点为新教育之特质，亦为新教育之理想；盖在事实上不但是中国之新教育未曾做到，即西洋之新教育亦不曾完全做到。所不同者：中国之新教育系沿袭西洋新教育而来，西洋之新教育系由经验演进而来；因而中国之新教育，较之西洋的新教育，在某几方面为落后，距上述四种标帜，相差更远。但中国之实施新教育，历史虽较短，进步则较快，西洋以百余年完成者，在中国或可以数十年完成之。兹述中国新教育产生之经过及其所遇之困难。

二、近代教育之产生

在第一章，作者曾经说过，旧的教育是富于保守性的，非至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动，文化发生失调的现象时，教育很难有巨大的变动。所谓环境的变动，主要者是指物质方面的变迁，人口之增加，战争之爆发，学术与工具之新发明，及异种文化之接触。

前清末年，社会方面确起了数千年所未见的变动，新教育便是这种社会变动的必然产物。

我国社会制度、教育制度，自秦汉以后，变迁甚少，主要原因在未曾多与异种文明接触。向来与汉族接近之民族，其文化远在汉族之下，其所发生之影响较小。我国与西方各民族，因东南有大海之隔，西北有大山沙漠之隔，在过去少有交通机会。因此我国遂产生一种自大的思想，对于本国遗传下来的学说与制度，只有绝对的信仰，从不发生疑问；故二千年来，能共同遵守，无巨大之变动。到了明末，与西方民族接触之机会日多，西方文化逐渐输入，中国之社会与教育遂不得不变。

明末以来，与西方民族接触之方式有三种：一为传教，一为通商，一为战争；三者之中，尤以战争之影响为最大。明代万历崇祯之间（16世纪至17世纪），耶稣教徒先后入中国者甚多，最著者有意大利之利玛窦（Matteo Ricci），西班牙之庞迪我（Diego de pantoja），日耳曼之汤若望（Joannes Adams Schall Von Bell）等。他们均精于历算；关于历算及宗教之中文著述颇多。中国学者如徐文定（光启）、李凉庵（之藻）等，均与他们来往，研究历数之学。利、徐合译之《几何原本》，徐著之《农政全书》，均为科学之杰作。明末清初，来中国传教之旧教徒，其传教方法便是迎合中国人的心理，专把中国人所缺乏之科学知识做引线，表面上以传教为附带事业，对于敬天拜祖并不反对，故收效甚大。在欧洲的罗马教皇，不懂此中理由，于1704年（康熙四十三年）下教令反对此种传教方法，禁止教徒拜祖，引起国人愤怒，传教事业因此停顿，西洋科学之输入亦因此中断。

到了道光二十一年〔1841〕《江宁条约》^①成立，开五口通商，传教来华者日众，于是立教堂，设学校，以宣传教义，于中国文化，亦发生相当之影响。

中外通商之影响，较之传教更为重大。自明代葡萄牙人租有澳门以后，欧洲商船来中国者渐多。康熙、乾隆之间，欧人商业集中于广州与宁波两处，而广州为尤盛，自订五口通商之约以后，上海、厦门、福州之洋商日加发达，其势力逐渐由沿海而侵入内地，中国经济权逐渐落于外国资本家之手。有识者见此经济危机，又不能禁止外货之输入，则唯一的救济方法，厥为发达本国之工商业；欲发达本国之工商业，又非提倡工商实业教育不可。故新教育之产生，受中外通商之影响极大。

与西方民族接触之第三种方式为战争。道光以后，对外战争常常失败，民元前七二年即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英军陷舟山，侵宁波；二十三年〔1843〕陷吴淞，逼金陵；民元前五二年咸丰十年（1860）英法联军破天津，入北京；民元前二七年光绪十一年（1885）法兵侵福建台湾，占安南；民元前一八年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与日本宣战，海陆军皆败；民元前十二年光绪二十六年（1900）八国联军破天津，入北京。历次战争对于中国之政治与教育均有很大的影响；每战败一次，朝野受重大的刺激，人民心理均起重大之变化，因而产生革新政治与革新教育之思想。孙中山先生之革命思想，受中法战役之刺激而起，其革命行动，发端于中日战争之时，至八国联军入京津以后，而革命之势力日加扩大。可见国民革命之直接激发原因，实为对外战争之失败。即拥护清皇之立宪维新派，其发展亦与战争有关。有名之“戊戌政

^①〔特编注〕此处误。《江宁条约》即《中英南京条约》，此条约签订于1842年8月29日，即道光二十三年。

变”，即发生在中日战争后三年；而“立宪维新运动”，亦至庚子战败后，而后猛烈进行。科举之废除，新教育制度之颁布，亦均在庚子战败之后。所以中国之“新政治”、“新教育”是西方民族之大炮巨舰所威迫出来的。

三、近代教育进展中所遇之困难

近代教育产生以后，遇着许多困难，兹举其要者言之。第一为守旧者之反对。守旧者不明白国际局面的转变，以为中国旧有文物，只要好好保存，便足以应付时变，因而极力反对新教育与破坏新教育。第二，提倡新教育者对于新教育亦缺乏深切之了解。例如初期以制造枪炮轮船火车之术为新教育，继而又以纯粹模仿外洋之学制为新教育，因此适应中国客观需要之新教育，未能确立，其推行亦无一贯之计划。第三，国内政局之纠纷。新教育为新社会、新政治之一部分。在政治未上轨道以前，新教育不能作单方之发展。近代教育之推动，赖乎民族、民权、民生三种动力，前已述及。前清末年之立宪维新运动固告失败，民国初年之民主政治亦未成功。盖满清虽倒，继之而兴者为无数割据之军阀，遂酿成民国十余年之纷乱局面。所谓物质建设、社会建设，均停滞而未进行；新教育亦受此影响，而无长足之进步。但经十余年之痛苦经验，一般知识分子及新兴的工商业分子，对于中国之政治社会教育均有较深切之认识，而中国之国民革命乃能有初步之成功。初基始具之新教育，亦随国民革命之进展而有新的演变。不幸的是建设工作正在积极推进，我国忽遭日寇之侵略，遂有八年之艰苦抗战。期中除沦陷区外，教育工作仍照常进行，并有许多适时的改进。民三十四年〔1945〕胜利复员，我国教育遂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兹将我国近八十年来新教育制度演进之历程，作简略之叙述。

研究问题

- 一、何谓新教育？
- 二、中国新教育运动发生之原因？
- 三、中国新教育运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？

第十一章

近代学制之演进

新教育产生之原因，前已概述。七十余年来新教育之历史，约可分为三期。第一为新教育萌芽时期，起自同治元年至光绪二十七年（1862—1901），约四十年。此时期有单个之新式学校，而无整个之新式学制；新式学校为数甚少，大部分学校仍为传统的旧式学校，科举制度仍为此期高等教育之核心；所以严格讲起来，此期应当划入旧教育时代之末。第二为新教育发展时期，起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十年（1902—1921），约二十年。此期不但有新式之学校，而且有整个之新式学制；二十年中，学制虽有数度之改变，但重大改变之处甚少，学制之根本精神仍是一贯的。新式学校的数量逐渐增加，旧式学校之数量逐渐减少，千余年来传统之科举制度，亦在此期之初而废除。第三为学校系统改革时期，自民十一年〔1922〕以至现在。兹将各期学制演进之经过，略述于下。

一、新教育萌芽时期

在新教育萌芽之四十年中，新教育之进展可分为两期，而皆与对外战争之失败有关。自同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年〔1862—

1894] 为第一期，自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七年〔1895—1901〕为第二期。第一期有单个之新式学校，多系专门学校之性质，又未设预备学校，从旧教育出身之学生，对此专门课目不易了解；加以办理不认真，故收效甚微。第二期之新教育，虽亦止有单个学校，但学校本身组织较为周密，课程进展有较为合理之程序。又鉴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失败，渐觉富国强兵，不但须有新式之教育，而且须有新式之政治。故教育革新运动，变为政治革新运动之一部。新学制与新政制有不可分离的连锁关系，经庚子战败之刺激，而整个之新学制乃以产生。故第二期实为新学制孕育时期。

（一）第一期之新教育均为应付特殊需要而设。盖我国兴学动机在于对外。自五口通商以后，中外交涉日繁，于是政府不得不讲求西学，以养成翻译人才，自道光咸丰败于英法以后，西人之坚船利炮，震破我国人士之愚蒙，于是不得不讲求新式武备，以御外侮。由战争与通商之经验，知敌人之所长在于机器，不但军备须要机器，即商品之制造、矿产之开发、货物之运输等，莫非机器；欲富国强兵，又非讲究机器之制造不可。所以由同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年〔1862—1894〕，三十余年之间，政府所设立之新式学校不外三类：一曰外国语文学校，二曰实业学校，三曰海陆军备学校。请分述之：

1. 外国语文学校，设立最早者：（1）为京师同文馆。清廷受英法联军之威逼，感觉外交棘手，遂于咸丰十一年〔1861〕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；同治元年（民元前五〇年）〔1862〕感于外交人才之缺乏，开设京师同文馆，以造就翻译人才，始设英文，继设法文俄文。同治五年〔1866〕，又添设算学馆，练习天文算学，以为讲求制造轮船机器之预备。入学资格为举人贡生，并由此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，年龄在30岁以内者。肄业期间定为八年。课程除外国文外，有汉文、史地、代数、几何、三角、

微分、积分、天文、化学、测量、万国公法、金石、富国策等，皆分年分科选习；外国文则为共同必修科，自始至终皆当勤习，最后四年注重译书。(2) 上海广方言馆。同治二年（民元前四九年）〔1863〕，由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设立，以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为目的。入学系选近郡年在十四以下之俊秀儿童。课程除外国语文外，兼课经史小学。(3) 广州同文馆。同治三年（民元前四八年）〔1864〕设立，目的在培养八旗子弟翻译人才，至光绪三十一年〔1905〕改名为译学馆。(4) 湖北自强学堂。由湖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九年（民元前十九年）〔1893〕奏请设立于武昌，内分方言、算学、格致、商务四科，其后以教学困难，将算学一科改归两湖书院讲习，商务格致两科停办，实际所存只有方言一科，故又称方言学堂。以上各校，虽分设各科，然以教授外国语文为主体，故可称为外国语文专科学校。

2. 实业学校，设立最早者：(1) 为福建船政学堂，设于同治五年（民元前四六年）〔1866〕，左宗棠督福建，奏立船厂，并附设学堂，称曰船政学堂。堂分为二：曰前堂，习法文，学造船术；曰后堂，习英文，练驾驶术。课程除造船及驾驶应习科目外，并读《圣谕广训》、《孝经》，又课策论。其后又添设绘事院、驾驶学堂、管轮学堂及艺圃四所，艺童艺徒合三百余人。(2) 为上海机器学堂，附设江南制造局内，课机器制作之理与实习之法，设于同治六年（民元前四五年）〔1867〕。(3) 为天津电报学堂，设于光绪五年（民元前三三年）〔1879〕；上海电报学堂，设于光绪八年（民元前三〇年）〔1882〕。(4) 为北洋大学，由李鸿章创议，设于光绪十三年（民元前二五年）〔1887〕，但其内部组织之完成，则在中日战争以后。(5) 湖北矿业学堂、工程学堂，附设于湖北矿务局，于光绪十八年（民元前二〇年）〔1893〕开办。以上五种，均为实业学校。